

北京革命遗址史话

共青团北京市青运史研究室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革命遗址史话

许德珩题



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题字：许德珩

封面设计：孙凤娣

题图：张安

责任编辑：吴书杰

北京革命遗址史话

Beijing Geming Yizhi Shihua

共青团北京市委青运史研究室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25 印张 72 千字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700 册 定价 0.70 元

序

每个城市都有它值得书写的历史，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更是如此。它既是六朝古都，又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名城。李大钊同志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唤起民众觉悟；鲁迅先生曾在这里写下不朽文章。这里爆发过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芦沟桥事变及平津战役。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这里升起。无数革命先辈、志士仁人英勇奋斗的足迹，遍布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郭内外。解放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创业人，尽管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市容面貌日新月异，然而，许多当年革命者战斗过的地方，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开辟为革命遗迹、遗址，供后人瞻仰和接受教育。那些关于遗址的革命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有的则以史料形式存留下来。

恩格斯这样说过：“回忆过去的运动，对青年们是很有好处的。”中国也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

A4c25/04

师。”北京团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的同志，很早就萌生过将北京一些影响较大的革命遗址史料收集起来汇编成册的想法。随着近年来开展的“学史建碑”活动的不断深入，这一想法愈益强烈，终至有了今日之举。参加写作的，还有一些多年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部分在校大学生。在编写过程中，这些年轻人多次头顶烈日，跋涉于乡间，寻访今日健在的革命老人。他们经常挑灯夜著，查阅大量史料，付出了很多心血。作为一个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人，我感到编写此书对于青年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对开展青运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应当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此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九旬高龄的革命老前辈许德珩同志亲为此书题写书名。

青年朋友，当今之中国，正处在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正是青年人报国效力之时。希望你们在革命先辈的精神感召下，坚定革命理想，努力学习和工作。我坚信，几十年后，你们留在历史上的，将是更加值得铭记的光辉篇章。

金 鉴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目 次

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	蒋升阳 陈晓星	1
火烧赵家楼·····	陈喜庆	7
红楼星火·····	季 华 刘亚军	14
觉悟社在慈悲庵·····	晓 梅	22
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	吴太伯	26
火神庙与“二七”惨案·····	康 雪	32
春风几度高、石墓·····	丁 山	39
铁狮子胡同的丰碑·····	张 泓	49
李大钊烈士陵园·····	陈泰生	57
草岚子监狱·····	迟亦枫	65
前门东火车站·····	丁 青	74
樱桃沟的“保卫华北”石刻·····	陈喜庆	80
芦沟桥的炮声·····	陈 翔 杨迅雷	87
地下长城·····	张沫利	93
白乙化烈士陵园·····	刘谨桂	99
雄伟的老帽山·····	刘文良	105
序幕在这里拉开·····	孙五一	109

民主广场·····	李超英	116
一座石牌坊的历史变迁·····	陈泰生	122
编后记·····		128



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

蒋升阳 陈晓星

我国首都北京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古老城市。它既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也有催人奋进的现代革命遗址和历史文物。在被北京市文物局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就有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北京的故居——景山东胡同吉安所左巷八号(原为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

吉安所左巷与北京许许多多星罗棋布的胡同一样,是一条平平常常的小胡同,狭长曲折,幽静清洁。胡同深处的八号院,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四合院。如今,在北京保持原貌的四合院已经不多见了。在这个院子里,还能依稀辨出古朴的旧

貌，只是门楼被改建了，迎门的影壁已荡然无存，两旁的房子延伸出来，院子中央只留了一条可容一人通过的夹道。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院里居住了半年。

那是1918年6月，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生活，与新民学会的蔡和森等人一起，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一面自学，一面商讨今后的奋斗计划。这些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除去考虑个人的出路和前途，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急切想找到一条挽救祖国危亡，解除民族苦难的道路。正在这时候，原在湖南一师任教的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寄信给毛泽东，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政府在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做勤务工作，现在又来中国招募工人。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认为可以到靠近俄国和东欧的法国去了解世界革命情况，于是在湖南发起了勤工俭学运动。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张昆弟、罗学瓚、蔡和森等二十五人，为联系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了古都北京。起初，大家散住在北京城里。毛泽东和蔡和森住在地安门附近的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的家里。由于居住分散，学习和商量事情都不方便，加上每天来回奔波十分疲劳，不久，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瓚等八人，搬到了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

在三眼井的这段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屋子很破旧，室内

陈设也十分简陋，靠墙是一个土炕，空地摆了一张白皮桌子和几个凳子。屋子太小了，不过十平方米。八个人睡在一个炕上十分拥挤，谁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个招呼。南方人不知道北京的冬天这么冷，被子没带足，再加上屋里又没火，只好将几个人的被子叠在一起，盖在身上，压得人连喘气都很困难。南方人喜欢吃米，北京却总是吃面。因此，吃饭也不习惯。他们也不会做饭。买回米面，就用水和成浆糊。后来亏了房东帮忙，才渐渐好些。饮食起居虽然艰苦，毛泽东他们却感到生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毛泽东与其他新民学会成员来京，主要是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但是，组织勤工俭学的华法教育会还没有为勤工俭学学生创造出国条件，出国旅费没有筹好，在法国学习、工作的地方也没有安排妥当，一时不能启程。一部分人情绪不安，有的口出怨言。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大家：“我们既来了，就不必急，先安顿下来，再找一些人商量，总会想出办法来的。”后经杨昌济先生帮助，蔡元培（时为北大校长）答应开办出国预备班。预备班分设在北京大学、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和蠡县布里村，后来又在长辛店增设了一个班。

毛泽东和蔡和森妥善地把同伴们安排到预备班后，又进一步为他们做出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到华法教育会接洽，与湖南在京知名人士及其他有关人士联系，到济工局借款筹备旅费，起草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办理出国手续等等。毛泽东日夜奔忙，不知疲倦地工作，赢得了大家的热情赞扬。罗学瓚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

班，出力甚多，才智多为同学们钦佩。”毛润之即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具体组织和安排下，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19年3月踏上了赴法航程。

毛泽东作为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自己却没有出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使他觉得自己应留在国内：第一，对于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还必须做更多的调查研究；第二，“中国古今学说的大概”没有弄清楚，出国也无益；第三，国内还有许多迫切的事情要做，尤其是新民学会要做好长期办下去的准备。此时，毛泽东对应该怎样学习，怎样探索社会，已有着明确的认识。

毛泽东到北京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想找个职业。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当上了图书馆助理员，每月薪金八元。图书馆在沙滩北大红楼，毛泽东的工作地点是一层西头的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具体工作是登记每日报刊和阅览人员姓名。毛泽东不爱修饰，经常穿一件蓝布大褂，上午在图书馆管理书报，登记阅读人数，下午到李大钊办公室外边的一间会议室，帮助李大钊拆看公文和信件。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期间，正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是黑暗的旧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第一人。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还为北大图书馆购买

了大量中外文书籍,尤其注意收集外文原著,从而为渴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和李大钊共处的日子里,毛泽东亲聆李大钊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还经常和老友邓中夏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这时,他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接近马克思主义。他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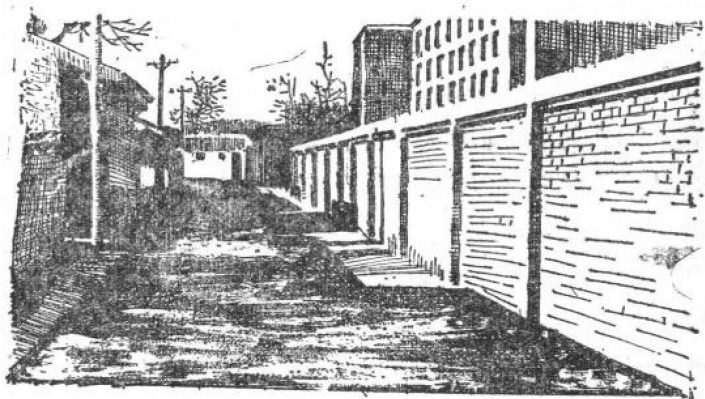
北大的学术团体很多,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当时,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在中国还是一种创举,每周举行一次研究会,有三、四十人参加,《京报》主笔邵飘萍担任教师。毛泽东同邵飘萍很接近,在有关新闻工作业务知识方面,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他的富于理想和优良品质也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北京,毛泽东还开始了同工人群众的接触。当时长辛店有一个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其中有不少湖南同学一面在预备班中学习,一面在长辛店铁路工厂里劳动,半工半读。这年初冬,毛泽东与蔡和森到了长辛店,同在这里的何长工等同学商谈去法国的路费问题。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搞调查,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机车车辆修理厂,有好几千工人。毛泽东第一次参观这样大的工厂,也是第一次同这么多的产业工人接触。他亲眼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劳作和生活,这给了他极深刻的印象。

豆腐池胡同九号,与长沙的板仓杨寓一样,是毛泽东常去

的地方。他经常同杨昌济教授讨论问题，加深了友谊，结成了最真挚的忘年之交。同时，毛泽东在这里与杨昌济先生的爱女杨开慧重逢。毛泽东亲切地指导杨开慧学习各种进步书刊，讲解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他们时常沐着春光，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万树梨花，谈论着理想和祖国未来的春天。

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北京是值得留恋的。这里有丰富的进步思想，新结交的仁人志士，还有恋人杨开慧。但是，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忘不了生活和奋斗了二十六年的湖南。于是，1919年3月，他告别了生活半年的北京，结束了第一次北京之行。



火烧赵家楼

陈喜庆

北京东城有两条前后相邻、东西走向的胡同：一条叫前赵家楼胡同，一条叫后赵家楼胡同。北京的老住户习惯把这两条胡同统称为赵家楼。赵家楼并没有楼。二十世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前后赵家楼胡同之间有一处华贵的宅子，内分东西两个院落。西院是中式平房，东院是西式平房。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的公馆。1919年，“五·四”运动最壮烈的一幕——火烧赵家楼，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如今，除了东面还残存着一段二十多米长的高墙以外，昔日曹公馆早已荡然无存。然而，当人们看到那段围墙，当年火烧赵家楼

的火光仿佛还在眼前闪耀……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完全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3日晚七时，北京大学学生及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千余人，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商讨救国办法。大会开始后，北大学生丁肇青、许德珩、谢绍敏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登台发言，纷纷表示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揭之于众。立刻掌声、欢呼声相继而起，会场气氛达到了沸点。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了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等四项决定。

5月4日是星期天。下午一时许，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医科大学前身）、汇文中学（今二十六中学前身）、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前身）、法政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三千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前。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即列队出发，直奔东交民巷使馆区。刚行进到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就被守卫在那里的中国巡捕拦住了，声称没有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不得入内。国家还没有亡，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通行了，如果真的亡了，将会怎样呢？学生们愤怒了！由外侮想到国贼，于是，当有人号召“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时候，游行队伍犹如不可遏止的洪流，浩浩荡荡涌向赵家楼。

5月的北京，中午前后已有几分燥热，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更热。他们挥动着写有标语的白色小旗，高呼着口号，并将一张张传单抛向空中。白色的小旗，震天的口号，飞舞的传单，构成了一副壮烈的救国画卷。沿途行人和市民纷纷驻足，脱帽鼓掌，表示支持，不少人滴下了感动的泪水，就连一些巡警也为之动容。最令人注目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游行队伍中，用长竹竿高高挑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曹瞒即曹操，当时人们都把他当作大奸臣，这里用来讥讽曹汝霖。章惇，北宋人，被司马光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这里是用来嘲弄章宗祥。

说来也巧，这天中午，大总统徐世昌为从日本归来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设宴洗尘，交通总长曹汝霖、制币总裁陆宗輿应邀赴宴。三个卖国贼再度重逢。曹、章、陆三人全是江浙一带人，早年一同留学日本，回国后皆因长于权术，沆瀣一气，都担任了政府要职。这三人身为中国官吏，却怀葵花向日(本)之心，任职期间，卖国罪状，罄竹难书。1897年，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舰强占了胶州湾(青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了青岛，但并未将青岛交还中国，也不撤军。对此，腐败无能的北京政府竟不敢理直气壮地向日本提出要求。当年12月14日，身

为驻日公使的陆宗輿致电当时任外交次长的曹汝霖说：“正式要求撤兵必须稍待，恐速反不达。”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1915年又向北京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心切，派出外交次长曹汝霖等为代表，与日本谈判。谈判期间，日本代表坠马受伤，谈判理应暂停或日方更换代表，可曹汝霖等竟在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内日方代表床前设桌，继续谈判，成为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的一桩罕见丑闻。经过几个月的谈判，5月9日，袁世凯政府不顾国家利益，承认了二十一条。曹汝霖拟定了接受二十一条的文稿，并亲自送到日本使馆。5月9日是一个屈辱的日子，后来中国人民把这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日本依据二十一条占据山东举国反对，但是1917年章宗祥替回陆宗輿任驻日公使后，却表示“欣然同意”，并就山东问题同日本正式换文，立下字据，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以致使中国的外交在巴黎和会上遭到惨败。正因为如此，中国学生把章宗祥和签定二十一条的主角曹汝霖、陆宗輿并列为三大卖国贼。宴席间，曹、章、陆三人正吃得起劲，传来学生示威，要求惩办国贼的消息。有人劝他们暂留公府，他们却认为乳臭未干的徒手学生不会怎么样，况且已布置了军警保护。所以，两点半左右，曹、章等人大摆大摇地回到了赵家楼。

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出发，转北走户部街，东行，经富贵街、东户部街、东三座门大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往北走米市大街，东折进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穿过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沿宝珠子胡同前行，到